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xiv + 254pp.

梁加農*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圍繞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斷裂與延續，即所謂「前後三十年」，學界有很多爭議；不過都承認毛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分隔的社會結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制度延續之一。著名學者丁學良便認為：毛時代和鄧時代的制度延續「中間沒有什麼比城鄉分隔的結構更重要了」，謂之「二十世紀一個最大的准農奴制度」。¹

過去的學術著作中，城鄉普通民眾在這一制度下的生活境遇及個人感受，往往在一些宏大的歷史敘述下被高度簡略化了。本書作者周傑榮（Jeremy Brown）現任教於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歷史系，以天津市及鄰近的十幾個縣在城鄉分隔制度下的普通民眾為研究對象，從天津市、區檔案館及基層單位的人事檔案出發，結合對當事人的訪談及其他有關史料，包括從天津民間舊書市場搜集的大批非正式出版的黨政文件、內部報告、未刊手稿、私人日記；勾勒出了毛時代城鄉分隔社會結構的歷史梗概，提供了普通民眾被強制、調適和抵制的豐富案例，是第一部分對天津地區 1949 至 1978 年（即「前三十年」）的城鄉分隔問題進行系統考察的史學專著。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城市主導農村：天津 1950 年代初期的城鄉治理」

*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Magna International Inc.）工程師、六西格瑪黑帶（Six Sigma Black Belt）

¹ 丁學良，《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頁 66。

和第二章「吃飯、遷徙和就業」，敘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 1958 年「大躍進」時期天津的城鄉關係，指出天津作為通商口岸和工業中心，繼承了過去的傳統，不斷吸納周邊農民進城就業，同時也是災民、難民、游民的暫棲之地。雖然城鄉遷徙的自由開始受限，但不甚嚴格，是城鄉分隔制度的「史前史」。1951 至 1957 年共有 78 萬多人從農村進入天津市區工作或與家人團聚，天津各單位新招募職工共 40 萬 9 千人（頁 47），市區人口達到 350 萬人的高峰。

第三章「天津的『大躍進』：城市倖存、農村挨餓」和第四章「1961 至 1963 年大規模精簡城市人口」，都是有關 1958 年大躍進導致其後 3 年大災荒，即所謂「困難時期」天津城鄉民眾生活境遇的敘述。面對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中央實行的是「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傾斜方針。天津市區居民雖減少定量，「瓜菜代」，糧食供應仍頻頻告急，以致國家最後不得不動用外匯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1961 年 2 月，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拯救了許多普通民眾的生命。此前，天津只剩 3 天口糧（頁 67），而在中央調完了四川的糧食給北京、天津後，全國已無糧可調了。

為減輕糧食供應的沉重壓力，天津也像其他大中城市一樣，發起大規模的精簡城市人口運動，目標是 22 萬職工、40 萬城市人口；規定 1958 年 1 月後進城的必須回鄉，之前的則自願；原來市區城市戶口的則不在精簡範圍。雖然各級組織層層動員，精簡仍遇到了很大阻力，有 7 人自殺未遂（頁 91），最後實際淨精簡人數只有十三萬多（頁 106）。此後，只好進一步強化戶口制度，城鄉分隔，嚴格將每一個人固定在一個位置。城鎮居民每戶有公安派出所登記和發放的「戶口本」，有「糧本」實行糧油定量供應；在農村的「農業人口」只能「自力更生」，嚴格限制向城鎮流動。

在空前嚴重的糧食壓力下，黑市食物交易也開始活躍，以致到 1962 年 7 月有關方面最後不得不「開放攤販市場」；至年底天津註冊的小販達七千多，其中有 2,322 人是「被精簡的職工」，註冊的小販平均月收入 125 元，遠高過

國營企業職工平均月工資 50 至 70 元的水平（頁 75）。

第五章「『四清運動』和天津青年的窮鄉僻壤」，講到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1964 年在天津攤販市場、小站鎮、西右營村走動一下，就斷言城鄉資本主義泛濫，幾句話就將西右營村女黨支部書記張鳳琴等一大批農村基層幹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還作了個極左的「天津小站四清報告」，城鄉分隔更惡化。

第六章「純化城市人口：文化大革命中遣送政治上的『不純』分子下鄉」，敘述文革時期天津市區居民下放到農村落戶。官方統計的有 41,571 人（頁 144）。1966 年秋開始被遣送下鄉的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黑五類分子」，1968 年擴大到「十種人」，包括有過「流氓行爲」、「男女關係問題」、黑市買賣食物的人。遣送下鄉都是從上而下的政府行爲，中共中央、天津市革命委員會都發過正式公文的紅頭文件，不是下面的「紅衛兵」或「造反派」所為。

第七章「1960 至 1970 年代的非農非城人員」，主要介紹另類「非農業人口」的二個單位，一是 1956 年模仿蘇聯國營農場在天津市郊建立的「天津市工農聯盟國營農場」，二是 1969 年在遠離天津、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區更樂鎮建立的「三線」單位天津鐵廠。第八章「被閹割的小靳莊：1974 至 1978 年城市占有的一個模範村莊」，講述文革後期天津市遠郊寶坻縣小靳莊的史事。

周傑榮沉潛於地方和基層，字裡行間也流露出對城鄉分隔制度下普通民眾生活和命運的人道關懷。至於為甚麼出現這一史無前例的制度，本書結論指出這是毛時代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無意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一方面追求更公正平等的新社會，致力於農村教育、衛生以及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提高了農村識字率 and 人均壽命；另一方面，又選擇蘇聯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兩者互相矛盾衝突，後者全面壓倒前者，導致城鄉分隔結構的出現（頁 1-3）。

不過，這還只是從一般意義上立論，理由似乎寬泛了一些。蘇聯體制並沒

有城鄉分隔這一項，這是中國對其所作的「制度創新」。1949年後，中國實現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各級組織對城市單位和農村基層垂直、強力的領導。如1960年四川也嚴重缺糧、農村已大量餓死人，但地方政府仍然能有效動員民眾把糧食運往他鄉。²如果要探究城鄉分隔制度之所以在毛時代出現的原因，只從地方和基層考察恐怕是不夠的。嚴格說來，這樣的制度創新，與毛及中共中央的決策思路有更為密切之關係。但本書中，毛卻幾乎沒有作為個人出現（頁8）。

從現有史料也隱約可見毛某些個人主動性因素，「有意」與「無意」之間，有時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早在城鄉分隔「史前史」時期的1953年1月，據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回憶，陳伯達就向其表示了毛澤東心中的農民未來「就是如何組織農業的『產業軍』」，杜氏感到其實是一種「勞動營」。³1953年9月毛批判全國政協常委梁漱溟關於城鄉差距太大的意見，謂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⁴1958年大躍進時，毛多次提出建立准軍事化的農民「產業軍」和「農村產業軍」。⁵

1960年代初「困難時期」，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陳雲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收拾殘局，「主要抓了兩件事：一件是動員城市兩千萬人下鄉，另一件是通過炒肉片、高價糖果等，回籠貨幣六十億」，⁶都是優惠城市而犧牲農村；或如周傑榮所謂把農村當作城市傾倒垃圾的地方（dumping ground, 頁2）。而且這種思想是一以貫之的。1950年陳雲就說韓戰的額外軍費「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產階級找出路……還是多剝削農

² 參見廖伯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回憶四川「蕭李廖事件」〉（上），《當代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8、15、17。

³ 參見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劉之爭的一個解讀〉，《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頁10-12。

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卷2，頁164、167-168。

⁵ 《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3，頁427、529。

⁶ 陳雲，〈工作要抓實〉，收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陳雲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卷3，頁377。

民」。⁷1964年劉少奇主持的「四清運動」，也惡化了城鄉分隔。最近披露的一位原天津四清工作隊員的回憶說：「我們都住在城市帶衛生間的樓房，卻下來整住土坯房的農村基層幹部」，明明感到在土坯房上廁所都很困難，離追求財富、舒適的所謂「資本主義」遠的很，卻迎合上意說農村「復辟資本主義」。⁸凡此種種，根本原因還是在上面，只從地方和基層考察是難以完全解釋的。

⁷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編，《批判陳雲專刊》，期2（1967年5月），頁23。轉引自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合作化運動與大飢荒〉，《二十一世紀》，總期136（2013年4月號），頁70。

⁸ 王輝，〈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報告〉，《炎黃春秋》，2014年第1期，頁18-20。